

# 孙中山、唐继尧关系与二次护法的顿挫

张建宇

**【摘要】**孙中山与唐继尧关系之演变,是影响二次护法及西南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1921年2月唐继尧被部属顾品珍驱逐出滇,直接置身于孙中山在两广的护法事业,成为各方瞩目的关键力量。孙中山争取唐继尧,对其未来回滇复权许以重诺,意在邀唐所部滇军合作北伐;然因陈炯明反对北伐,支持并促成唐继尧“二次回滇”,造成广西滇军主力未能加入北伐序列,愿意北伐的顾品珍反而败亡。孙、唐关系之演变直接造成孙中山北伐计划的落空和二次护法的顿挫,并间接影响到后来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和依靠对象的选择。

**【关键词】**孙中山;唐继尧;二次护法;西南政局

**【作者简介】**张建宇,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22.6.270~279

孙中山在广东先后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始终是其积极争取的对象。既有研究主要着力于对二人关系演变基本趋势的总体论述和对唐继尧的个人评价,<sup>①</sup>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过程对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影响,<sup>②</sup>但学界对于孙中山、唐继尧关系演变的具体动因关注不足,对其所导致的后果也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1921年2月,在孙中山领导二次护法过程中,时任军政府总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唐继尧被部下、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驱逐,滇局发生剧变,唐继尧被迫辗转来粤,直至次年3月回滇重掌实权。其间孙、唐二人得以有更多直接往来,双方在总统选举、“援桂”等事项上形成过合作,最终又因“北伐”抑或“回滇”的不同诉求而疏离。本文利用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未刊档案及其他相关档案、函电、报刊等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西南护法和孙、唐二人关系演变的

整体视域,探讨这一时期孙、唐关系由合到分的具体演变过程,以及对孙中山北伐计划造成的后果,以期揭示孙、唐关系对于二次护法和西南政局之重要影响。

## 一、1921年滇变与孙中山的最初应对

1918年广州护法军政府改组之后,政学会与桂系逐渐联合,控制军政府,希望通过南北和会与北方达成局部议和,以维系自身利益,并对西南其他地方实力派与国会成员实行打压。其结果导致国会议长吴景濂、褚辅成等率领国会议员陆续赴沪,伍廷芳亦携带关余北上,四位军政府总裁孙中山、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在上海达成联合,并占据法理上的优势地位。<sup>③</sup>这是第一次护法运动后孙中山、唐继尧达成的联合关系。四总裁于1920年6月初至12月初,先后六次联合发表宣言,重申护法救国,在广东重建护法军政府。<sup>④</sup>随后,国会议员积极寻求国会迁地重开,孙中山则开始筹划

驱逐桂系。在推动驱桂过程中,唐继尧的滇军是孙中山寄望甚高的力量。<sup>⑤</sup>

孙中山南下二次开府广州后,军政府内部围绕组织联省政府抑或正式中央政府,争论激烈。孙中山主张舍弃护法、选举总统、组建正式政府;唐继尧和广东实力派陈炯明,以及吴景濂、褚辅成为首的益友社倾向成立联省政府。1921年元旦,孙中山公开演说,准备“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sup>⑥</sup>,陈炯明坚决反对,表示“护法区内,绝不宜有非法举动”<sup>⑦</sup>。唐继尧当时曾致电广州,委婉反对总统选举之事,称“目前南方基础未固,吾人唯一急务,须求内部之团结,然后再言改造。关于军府制度问题,应请出以审慎”<sup>⑧</sup>。在陈炯明的坚持下,孙中山只得决定“缓办选举,先攻广西”<sup>⑨</sup>,并于1921年2月1日复电唐继尧:“军府现正研求联省自治制,妥为提出,务期应时势之要求,立强固之基础,与尊电所云先团结而后改造一节,用意相同。”<sup>⑩</sup>

正当此时,1921年2月7日,唐氏部属、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以唐继尧连年驱使滇军南征北战为由,率驻川滇军进逼昆明,唐继尧无力阻挡,被迫宣布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即行裁撤,“所有维持地方各事宜,即由各卫戍区司令负责办理。其民政事仍由省长完全担任,继尧即日解除职务,俾资休养,以践息壤之言。”<sup>⑪</sup>次日,唐继尧出走离滇,云南所有职权由顾品珍兼摄。

滇变发生,对西南局势震动很大,孙中山首先考虑的是维持军政府在云南的影响力,决定先稳住顾品珍。孙中山研判认为,滇变主要源于唐、顾二人政见相左,“唐继尧之失足,因彼对于南北两方面向持首尾两端之态度,只知以己地位为本位,趋于私利,因此颇招一般人士之恶感与本省人民之离叛。此际突遭顾品珍等之反抗,遂至难以立足。”但这并不等于顾氏将倒向政学系,“即使将来云南局面归顾氏支配,顾氏亦绝对不能与余为敌。”<sup>⑫</sup>北京政府欲乘此时机与顾品珍接洽,电令刘

存厚了解顾氏态度,向其提出优厚条件:“(一)联滇以条件妥洽为主;(二)所有滇省军队概不裁决;(三)关于法律上之各项问题详为声明;(四)宣布中央对滇之希望及力谋统一之苦衷”<sup>⑬</sup>。陆荣廷亦“派亲信军人田承斌赴滇与云南顾品珍、叶荃接洽”<sup>⑭</sup>,并许诺“滇军欠饷,可代向北庭设法交付,但以滇省现驻军队为限”<sup>⑮</sup>。因此防止顾氏“北向”,成为孙中山重点规谋之事。2月14日,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采纳孙中山“羁縻顾品珍、赵又新等,免致北向”的主张,决定“以顾为总司令,赵为副司令,即日电滇查照”。<sup>⑯</sup>另有报章报道,军政府“派王某、李某二人刻日赴滇与顾氏接洽,以免其为北廷利用”<sup>⑰</sup>,并拟提出如下条件:“(一)军政府正式任命顾品珍为滇军总司令;(二)军政府拟联合各省改组联省政府,许顾品珍以某项重要之位置;(三)未改组以前许补选顾品珍为总裁;(四)收到关税余款后许拨给若干为滇军军费。”<sup>⑱</sup>

顾品珍执掌云南,首先注重笼络人心,强化对全省的控制。在就任滇军总司令职时,他宣称重点关注云南地方发展,实行公推省长、军民分治、铲除军阀政策、清理全滇财政,停止唐继尧的攻湘援桂各政策,<sup>⑲</sup>力图瓦解唐氏留在滇省的军事力量。同时决定仍然留在护法阵营,他向省议会表示,“滇为护法之区,当中央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自应与西南各省取同一态度”,但对加入军政府持观望态度,“惟加入粤军府与否,此时实难决定”。<sup>⑳</sup>至此,孙中山逐渐明晰顾品珍的态度,对云南采取待时而动的策略,同时重点争取已经离滇但仍拥有实力的唐继尧,希望后者在二次护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 二、“援桂”与总统选举中的孙、唐关系

唐继尧被逐出滇后,辗转赴港观望各方形势。孙中山希望唐继尧在总统选举和“援桂”(即1921年6月军政府计划讨伐桂系陆荣廷的粤桂战争)问题上支持自己,一度允其在粤募兵,并许诺助其回滇复权;唐继尧应邀赴粤,积极宣扬护法、

“援桂”，实则欲借“援桂”西征，顺势回滇。在这一时期，孙、唐虽有进一步合作的契机，但两人在实际目的上相差甚远，唐继尧愿望达成并不顺利。

1921年3月4日，孙中山偕同唐绍仪、伍廷芳电邀在港的唐继尧来粤，称“此间政务诸待协商，望即命来粤，共图进行”。<sup>②</sup>为邀请唐继尧来粤，广东方面煞费苦心，一面派代表先期驻港专候，一面在军府内布置一切，并将广州越秀山上的启秀楼重新粉饰，以备唐氏驻节。<sup>③</sup>9日，唐继尧从香港到达广州，孙中山等亲往车站迎接，军政府、国会、驻粤滇军、省议会等先后举行了欢迎仪式或宴会。在欢迎宴会上，孙中山高度评价唐继尧，称其离滇来粤不为失败，实为“大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也是“西南之成功”，并且“唐公现存之兵力，足以对外发展，且治军多年，诸多利赖。昔为云南独有之唐公，今后则为中华民国共有之唐公，此为中华民国之大成功也。”<sup>④</sup>

唐继尧此番虽被逐出滇，但滇军中依然有大量支持他的力量。3月4日，第五混成旅旅长胡若愚、第九团团团长张汝冀、十六团团团长周怀植等人在云南联合通电拥护唐继尧，称“唐公在滇一日，滇民可望相安，国家亦得稳固。此后滇事，仍得唐公主持，庶可蒸蒸日上。则今日之拥护唐公，即所以拥护云南；拥护云南，即不啻拥护约法，拥护国家也”。<sup>⑤</sup>此外，唐继尧部下尚有两师分驻蒙自、河口、开化、广南、阿述各属，其实力依然在顾品珍、叶荃之上。<sup>⑥</sup>孙中山邀唐来粤，一是希望他留粤执行总裁职务，并支持自己的正式总统选举主张，否则军政府总裁仅剩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不足法定人数，无法正常履行职能；二是希望他能支持“援桂”，联合进攻广西，当然主要还是意在羁縻唐继尧，将其纳入北伐序列。在此背景下，孙、唐双方就唐在粤募兵回滇、支持总统选举和“援桂”等问题展开协商。据报载，唐继尧募兵的范围主要包括“在粤解散之海疆军千余人，招集改编，合之驻粤赵德裕所部滇军，约计不下三师之

众”。<sup>⑦</sup>外界并有孙中山拟任唐继尧为援桂总司令之说。因此在众说纷纭的总统选举问题上，唐继尧不予公开反对，4月1日军政府政务会议上，他“声明不敢与闻其事”<sup>⑧</sup>；4月25日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既然由国会大多数举出，鄙人应当遵照国会之意见”，声称：“兄弟乃军人也，对于军事当负完全之责任。至政治如何设施，自当有政治家负责，此乃鄙人素抱之宗旨也。”<sup>⑨</sup>实际上，唐继尧着眼于回滇恢复统治，计划所招兵员成军之后，即担任出发“援桂”；“援桂”成功，即由桂入滇，恢复其原有之势力。<sup>⑩</sup>

但反对孙中山速选总统的益友社，亦意识到唐继尧被逐出滇，是可利用的干预总统选举的机会，而与唐继尧积极展开联络。唐继尧离滇之初，曾考虑赴日游历，吴景濂、汪彭年等暗地与唐绍仪、褚辅成等联络，希望联合唐与王文华、刘显世等贵州旧派势力，以及郭同、吕复、陈策、张瑞萱等国会议员共同在上海组织一个对抗国民党的新政党。<sup>⑪</sup>唐继尧抵港后，益友社转而积极促成其参与“援桂”，以延缓总统选举之进行。但由于自身缺乏足够实力，益友社只能依靠立场相近的陈炯明促成此事，其计划是劝说陈炯明“速攻广西，并请其帮助协和（指李烈钧——引者注）军饷，共同作战”，之后再促成唐继尧、李烈钧的部队在广西会合，“联成一气，加之赵德裕、赖世璜、李明扬所部足有三师，以三师之众集中一处，攸往咸宜。”<sup>⑫</sup>如此既可收“援桂”之效，亦可避免政学系分别联络、各个击破，削弱护法实力。为推动此计划实现，益友社成员罗家衡受吴景濂等派遣，三次赴港拜访唐继尧。4月2日，罗氏在回函中称，唐继尧主张“西南机关主合议制”；对于云南，则力图恢复，其具体方法，“借援桂为名，将军队集中贵阳，与协军联络。再第一步维持黔局，第二步或回滇或攻桂或出湘，俟机会再决党事。”<sup>⑬</sup>显然，益友社先“援桂”、再回滇的设想，更加符合唐继尧的利益。

孙中山与益友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意见相

左,均期望获取唐继尧支持,并都以助其“援桂”后回滇作为交换,“援桂”实际是各方利益的公约数。基于此,唐继尧抵粤后积极宣扬以护法为己任,并表明滇省方面实力并未丧失,自身具备“援桂”实力,“现在桂边之滇军仍然拥戴于己,绝未受他方面之笼络”<sup>③</sup>。然而,唐继尧期以借“援桂”之名,行回滇之实,却一时并未成功。其直接原因,一则在粤募兵之事并未得陈炯明认同,后者以为此举徒令粤省受累,故极力反对;<sup>④</sup>二是回滇经费筹备尚须时日,唐继尧曾告以罗家衡,“须先立一银行,以资帮助”;<sup>⑤</sup>三是孙中山调整“援桂”和总统选举的推行顺序,总统选举迅速达成,益友社成员遂纷纷离粤北上,另寻出路。<sup>⑥</sup>1921年5月4日,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联名通电,“中华民国大总统已定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政府成立,军政府即应于是日取消,所有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自应解除。”<sup>⑦</sup>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大总统。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滇变的最初应对,对唐继尧、顾品珍的分头争取,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成功,有利于自身主张的贯彻和落实。唐继尧盱衡时局,在回滇之事并无确定把握时,也没有将自己公开置于孙中山和军政府的对立面。但从日后局势发展来看,唐继尧对于联合益友社、陈炯明等势力亲自参与“援桂”而回滇之议更为认同。因此,在总统选举已成定局,“援桂”战争迫在眉睫,筹谋回滇又窒碍难行的背景下,唐继尧便借口“养病”,自广州返港,蛰伏待时。

### 三、对驻桂滇军的争取与北伐计划的落空

“援桂”战事正式爆发后,唐继尧调整回滇策略,命令拥唐滇军以参与“援桂”的名义离开云南,进入广西。滇军在“援桂”之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广西战事结束后,集结于桂林、柳州。对于在广西的各支滇军,孙、唐二人分别展开争取,以实现各自的“北伐”或“回滇”目标。最终唐继尧在陈炯明的支持下,成功率亲信部队回滇,与孙中山

分道扬镳。这一结果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北伐大计乃至整个二次护法的最终结局。

1921年5月28日,孙中山命令多路并进讨伐桂系陆荣廷,派陈炯明率粤军精锐出肇庆以趋梧州,又命许崇智由北江入桂夹击,李烈钧率滇、赣军分由黔、湘出击,谷正伦率黔军,齐向桂林,并约湘军同时攻入。<sup>⑧</sup>李烈钧部滇军本为驻粤滇军的主力,在“援桂”之前,暂驻湘西整顿,改编为四旅,以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王均分统之,其中尤以杨益谦旅为最精锐。<sup>⑨</sup>6月23日,李烈钧致电孙中山,告以“滇军奉大总统、联帅命令援桂,扶植桂人自治,已开始运动,即分途攻入桂境,直捣腹地”。<sup>⑩</sup>在“援桂”之役中,唐系滇军胡若愚、李友勋、龙云部在攻克桂林、柳州的战斗中作战勇猛,“先遣军司令官胡若愚率部会同粤第二军旅长吴忠信及赣军彭成万等部围攻桂林,胡部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卒以寡胜众,首先击败桂军沈鸿英部于桂林,克桂林。”<sup>⑪</sup>李烈钧等随后率部进驻桂林。桂林克复之后,杨益谦任总指挥,与胡若愚部共驻桂林,李烈钧驻桂林以北约一百公里处的长安。原云南第二卫戍区司令李友勋在滇变后反对顾品珍,借护法为名离滇,于8月初进据柳州。<sup>⑫</sup>至此,两路滇军集结于桂、柳,这既为孙中山自广西北伐提供了可能,亦为唐继尧由桂回滇创造了机会。

唐继尧谋求回滇复权,李烈钧自始至终不予支持。原云南陆军第十一团团团长龙云刚到柳州时,曾致电唐继尧,告以“回滇大计,协老(指李烈钧——引者注)似固执己见,难得赞同”。<sup>⑬</sup>柳州方面的李友勋、龙云以及桂林方面的胡若愚对于回滇之事则颇表赞同,杨益谦亦有被唐继尧拉拢之势。目睹驻桂滇军暗流涌动,李烈钧建议孙中山亲临广西坐镇,吸纳杨益谦部滇军,速行北伐。9月13日他致电孙中山,极力强调孙中山应亲来广西,认为“其于根本计划,尤能发挥尽致”。<sup>⑭</sup>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10月15日孙中山自粤启程赴桂林,18日李烈钧自长安赴桂林。10月27日,李烈

钧任命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免去意图助唐回滇的杨益谦旅长一职,改任参谋部参议。<sup>⑤</sup>11月1日,孙中山复电李烈钧,告以撤消杨益谦军职“措置如法,获免燎原”,认可其对滇军军官的具体委任。<sup>⑥</sup>

孙中山到达广西后,电邀唐继尧自香港来梧州共商北伐大计,同时派汪精卫、伍朝枢赴香港促驾。唐继尧并未直接拒绝,表示“余对于戡乱讨贼一事,向取一致的态度”,“余惟大总统之马首是瞻,余之所部对于北伐,必愿作前驱”。<sup>⑦</sup>后又致函强调,北伐当准备充分、从缓进行,“大计既定,举后方之巩固,兵力之配编,械弹之充补,饷糈之筹措,在在均关重要。”<sup>⑧</sup>得知孙中山赴桂后,柳州方面的滇军致电唐继尧,称“中山仓促来此,虽为促进向外发展,其中又难免不无作用,野心者又未尝不思乘机而起”,希望唐继尧亲临坐阵,稳定军心,并设法解决款项问题。<sup>⑨</sup>唐继尧回应称,“饷已筹,到柳即可接济”,“现与某方接洽,积极帮助我军移动。”<sup>⑩</sup>唐继尧提及的某方,即为陈炯明,双方此时已就回滇之事有过沟通。

唐继尧、陈炯明皆认同联省自治,兼有益友社居间牵线。早在唐继尧离滇到港之初,陈炯明即派部下陈炯光、马育航赴港,就即行北伐抑或先回定滇局征求唐氏意见。唐继尧回应称,“须先回滇筹备后方接济,始能北伐”;唐继尧在广州时,复与陈炯明进一步商定,“即不能直接相助,亦望于万一发生意外时,勿加以压逼”;陈炯明当即应允,称“粤军势力所及之地,决不阻碍唐部之回滇”。<sup>⑪</sup>在广州期间,唐继尧在4月1日的军政府政务会议上,对于组织联省政府,表示若实行自治,“湘黔两省,易得同意,即将来川滇亦不难逐渐联络”。<sup>⑫</sup>同时谢绝了孙中山任命其为滇粤桂联军总司令的提议。陈炯明对孙中山北伐之事本不赞同,先派人赴港告知唐继尧其反对北伐的决定,称“是所谓北伐策源地之两粤,先已不能出一兵矣”<sup>⑬</sup>,同时对唐继尧属下部队的移动及饷项诸事,均愿竭力赞

助。<sup>⑭</sup>在知悉孙中山派人赴港邀唐继尧赴桂后,陈炯明又立刻派部下陈觉民到港,坚请唐赴广州商讨后续计划。

唐继尧赴桂之前,已对时局作出判断,并在孙、陈间作出了选择。他认为“孙仍死守其统一集权政策,其不能顺应人心,以博全国之同情,可以逆睹”;同时又十分担心孙中山借北伐分化滇军,如撤消滇军名义、改编滇军归李烈钧统率,或破坏滇军内部稳定团结等;对于陈炯明的援助,唐认为陈“一惧孙、李(烈钧)得势,颇为不安;一欲滇军离桂,事权统一”,其举动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但对自己有莫大好处,“孙无实力,我复得陈援,殊不足虑”。<sup>⑮</sup>于是在孙、陈之间,选择了与陈合作。1921年12月3日,唐继尧乘船先赴广州,翌日抵达,陈炯明命陈觉民将唐迎候至粤军总司令部会谈。<sup>⑯</sup>陈炯明给予唐的具体支持包括“现款十万元,步枪一千枝,子弹五十万粒,自来德手枪四十挺”,如孙中山下令阻止唐由桂回滇,陈炯明愿“电广西所驻粤军将领,妥护出境”。<sup>⑰</sup>12月5日,唐继尧由广州抵达梧州,此时距孙中山发出邀请已过月余。7日,有记者询问其此次出山的意见,唐继尧虽仍在口头上强调自己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和北伐,称:“世人不察,多疑兄弟主张滇军回滇,与中山之主张北伐背道而驰,不知兄弟自袁洪宪坏法而后,即树护法旗帜,此志始终不渝。……此次滇军回滇之说兴,实因滇军离家多年,加之饷项支绌,遂兴思家之念。兄弟因此一事,亦不能不来桂一慰劳。……此次中山北伐,兄弟正希望其先团结粤桂川湘六省兵力,一致行动”。<sup>⑱</sup>但事实上唐继尧并未前往孙中山驻节的桂林,而于次日启程前往柳州,显然是按照与陈炯明商定的计划行事。为阻止唐氏另生枝节,孙中山一方的胡汉民致电胡瑛,“请唐公直来桂林,不必赴柳”。胡瑛复电胡汉民称:“唐公此次赴柳,乃慰问军士起见,并无他意。在柳逗留不过三数日,即兼程赴桂谒大总统请示方略。……此行既在追随大总统出征,义无

回顾。”<sup>55</sup>显然唐将实际意图和真实态度,向胡有所隐瞒。唐继尧抵达柳州后,旋即布置回滇事宜,迅速召开军事会议,“全体军官皆主张先定滇局,然后北伐”,先谋对顾品珍的“根本解决”。<sup>56</sup>1922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就任滇黔联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柳州。<sup>57</sup>

随着唐继尧回滇意图的逐渐显露,顾品珍对军政府的态度转趋积极,意欲通过参与北伐,获取孙中山的支持,以增强抵制唐的力量。早在1921年9月,顾品珍曾致电孙中山,主张及时北伐,孙中山复电赞其“葦筹硕画,良深钦佩”,并详询其兵数、编制及“何日由何地开拔”等具体事宜。<sup>58</sup>11月6日,顾品珍再次致电孙中山,反对唐继尧回滇,“除飭属一体严密防范外,仍拟出兵三混成旅,藉效驱驰,以贯彻护法之初衷。”<sup>59</sup>11月18日,顾品珍通电各方,称已任命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杨希闵为北伐第一路司令,杨蓁为北伐第二路司令,金汉鼎为北伐第三路司令,各率所部集中待发,准备北伐。<sup>60</sup>唐继尧抵达广西后,孙中山于12月13日复电顾品珍,对其北伐准备及建议予以肯定,称“执事辞卸兼职,专理军政,躬率劲旅,驰赴北方,俾地方举分治之实,疆场收合作之功,体国公忠,洵属超越流辈,毋任欣佩。所委各司令,皆一时干城之选,底定中原,胥于此举是赖。划定区域,分防专责,尤为战略上要着,当就各省壤地及交通上之便利,妥为区划,再行分达。”<sup>61</sup>随后加紧争取云南方面之实际动作,翌年1月又电促顾品珍、范石生、杨希闵、蒋光亮、杨蓁等尽快启动北伐,“现在时机迫促,滇省道途修阻,希即赶紧拔队前进为盼”<sup>62</sup>。

但即使在唐继尧极力谋求回滇、不愿北伐的情况下,孙中山仍然采取了诸多挽救措施,力促唐率队参加北伐。<sup>63</sup>他先派专员赴柳州,催促唐继尧赴桂林参加军事会议;<sup>64</sup>在催促无效的情况下,1922年2月23日,孙中山发布对唐继尧的“制止令”,谴责唐不顾大局的行为,称其“假名筹备北

伐,实冀反戈回滇”,命令“各该省长、总司令等,迅即严行制止唐继尧前进,毋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sup>65</sup>然而制止令未能奏效。3月,唐继尧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率军返滇,击败顾品珍部,顾品珍阵亡,唐继尧重掌云南政权,史称“二次回滇”。<sup>66</sup>

唐继尧带领大量滇军离桂回滇,而愿意参与北伐的顾品珍败亡,使得孙中山可以依靠的北伐军力大为减少(滇军中只有李烈钧部支持孙中山),由桂北伐的计划受到根本性影响;后虽改由江西北伐,最终还是无果而终。唐继尧在回滇后倡行联省自治,宣称“联省自治,为解决吾国目前时局之必要主义,即西南各省,亦大多群抱同一之希望,并唯一之主张”<sup>67</sup>,与陈炯明的联系更为密切,西南联治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个月后,广州发生“六一六兵变”。当然,孙中山也并非一无所得。唐继尧回滇后,原本隶属于顾品珍阵营的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部因不愿回滇附唐,遂经黔省赴桂,在孙中山的争取下,助孙回粤驱陈,打破了陈炯明、唐继尧、陆荣廷的合作同盟,<sup>68</sup>并在广西内部混战中支持刚刚崛起的新桂系,为日后两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结语

孙、唐关系之演变是影响二次护法期间西南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其间各方之博弈,在护法过程中似只是一个插曲,但结果并不限于西南内部各派势力的合纵连横和力量消长,实际上已对护法全局产生影响。孙中山在二次护法中,力主组建正式中央政府,集中各方力量北伐,但护法阵营内部立场并不统一。在此背景下,唐继尧能够起到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一方面,从孙中山、唐继尧、顾品珍三方关系来看,唐因顾的背叛而离滇来到两广,提供了孙、唐相互支持合作的契机;孙中山积极推动唐继尧参与由桂北伐,在未得唐继尧共同北伐之前,保留联合顾品珍以换取云南对北伐的支持;唐继尧致力于“援桂”顺势回滇复权,最

后唐胜顾亡,双方可能用于支持孙中山北伐的力量全部落空。另一方面,从孙中山、陈炯明、唐继尧三方关系来看,陈炯明、唐继尧在联治共同主张基础上日益趋近,增强了西南联治派的声势;唐在陈实力支持下实现“二次回滇”,与孙中山的北伐方略背道而驰,导致北伐流产;唐陈合作以及唐重新控制云南后实行联治政策,为陈下一步叛孙提供了外部助力。作为两个三角关系基轴的孙、唐关系,从趋向合作到最终疏离,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基于共同理念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一年中西南内部分化重组,导致二次护法的顿挫,直接影响到西南政局的变动;而孙中山联合滇军北伐的失败,必然强化对于地方军事领袖的负面观感,从后来孙中山改弦易辙,转向动员民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以两广为根据地再兴北伐,又或可看到该过程的间接影响。

#### 注释:

①陈长河:《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邵雍:《唐继尧与孙中山关系略论》,上海中山学社主编:《近代中国》第二十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8—27页。

②谢本书:《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③其时唐继尧仍在云南,李烈钧、王伯群先后作为唐的代表驻沪。

④孙中山:《与唐绍仪等联名发表移设军政府宣言》(1920年6月3日)、《与唐绍仪等联名重申护法救国宣言》(1920年7月28日)、《与唐绍仪等联名公告岑春煊陆荣廷与北方订约无效之宣言》(1920年10月23日)、《与唐绍仪等联名不承认北方宣布伪统一之宣言》(1920年10月31日)、《与唐绍仪等联名重组军政府发表政见宣言》(1920年12月1日)、《与唐绍仪等联名要求北方消除三项害国运动之宣言》(1920年12月6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4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7—448、448—449、451、451—452、456、457页。

⑤为打击桂系,孙中山多次致电唐继尧,希望云南配合援闽粤军夹击桂系,也具体指示驻湘滇军(即李烈钧率领的原驻粤滇军,后经粤北进入湘省,归云南节制)出兵广西;1920年8月驱桂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再次致电唐继尧,请派在湘滇军移师攻桂,但唐并未予以配合。参见孙中山:《复唐继尧告讨桂各军齐起可一举扑灭桂贼电》(1920年7月18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432页;《复何成濬商讨军事进取方略书》(1920年7月下旬),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8册,第188页;《复唐继尧请令在湘滇军攻桂并告粤军捷讯电》(1920年9月6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440页。

⑥孙中山:《应在广东建立正式政府以巩固民国基础》(1921年1月1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0册,第400页。

⑦吴景濂为告知陈炯明反对速选总统事致唐继尧、刘显世电(稿》(1921年1月20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1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43页。

⑧《唐继尧反对孙派举总统》,《晨报》1921年2月1日,第2版。

⑨《褚辅成就各派对选孙中山为总统之意事致吴景濂函》(1921年1月23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1册,第352页。

⑩《唐继尧反对孙派举总统》,《晨报》1921年2月1日,第2版。

⑪《为裁撤联军总司令部等情电广东军政府及各省军政长官》,1921年2月8日,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06-003-00094-002。

⑫孙中山:《云南局势与关余问题》(1921年2月12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2册,第106页。

⑬《西南最近之新局面与中央》,《晨报》1921年2月21日,第2版。

⑭《军政府财政之困穷》,《晨报》1921年2月26日,第3版。

⑮《陆荣廷收买滇省之计划》,《新国民日报》1921年3月22日,第3页。

⑯《行踪不明之唐继尧与滇局》,《晨报》1921年2月18日,第3版。实际上,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已于1920年10月在川阵亡。

⑰《粤军府与旧国会》,天津《大公报》1921年3月3日,第6版。

- ⑱《军府与顾品珍接商之条件》，《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2月23日，第3页。
- ⑲《顾品珍宣言就职》，天津《大公报》1921年3月20日，第3版。
- ⑳《西南最近之新局面与中央》，《晨报》1921年2月21日，第2版。
- ㉑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联名致唐继尧望即命驾来粤共图进行电》（1921年3月4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476页。
- ㉒《唐会泽蒞粤欢迎盛况纪略》，刘大伟、王水乔主编：《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第8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80页。
- ㉓孙中山：《唐继尧离滇来粤实其成功》（1921年3月12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0册，第408页。
- ㉔《胡若愚等拥护唐继尧的通电》（1921年3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昆明：云南日报社印刷厂，1985年，第38页。
- ㉕《唐继尧抵粤之先声》，《申报》1921年3月13日，第8版。时任驻川滇军第八军军长的叶荃自川回滇后，曾于1921年1月27日以闹饷为由突袭昆明，此举与顾品珍等人的行动并无直接联系，但分散了唐继尧的注意力，为顾品珍入昆创造了条件。详见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二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 ㉖《广州通信》，《益世报》1921年3月26日，第6版。
- ㉗《唐继尧出席政务会议》，长沙《大公报》1921年4月9日，第2版。
- ㉘《访员与唐继尧一席谈》，《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4月26日，第3页。
- ㉙《唐继尧将以全力争回滇省势力》，《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4月13日，第3页。
- ㉚「唐繼堯ノ動靜關報告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130600。
- ㉛《褚辅成就滇变后应取的对策事致吴景濂函》（1921年2月28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3册，第726—730页。
- ㉜《罗家衡为告知孙中山、唐继尧、陈炯明对目前时局问题的主张事致吴景濂等函》（1921年4月2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3册，第740—741页。
- ㉝《粤讯纪要》，天津《大公报》1921年3月20日，第6页。
- ㉞《陈炯明反对唐继尧在粤招兵》，《晨报》1921年4月13日，第3版。
- ㉟《罗家衡为告知孙中山、唐继尧、陈炯明对目前时局问题的主张事致吴景濂等函》（1921年4月2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3册，第741页。
- ㊱孙中山曾在陈炯明的反对下决定先“援桂”并缓选总统，后西征受挫，遂重提总统选举，陈炯明、益友社虽积极反对，但国会非常会议最终于4月召开，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相关过程可参见谷小水：《益友社与1921年非常大总统选举》，林家有主编：《孙中山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19—232页。
- ㊲孙中山：《与唐绍仪等联名宣告于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取消军政府通电》（1921年5月4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4册，第461页；《军政府通告取消》，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5月11日，第1张第3版。
- ㊳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126页。
- ㊴参见梦华：《云南特约通信》，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19日，第1张第4版。
- ㊵《李协和率师援桂》，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5日，第2张第6版。
- ㊶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6页。
- ㊷《攻克柳州桂林之经过》，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8月20日，第1张第6版。
- ㊸《龙云致唐继尧函》，1921年8月2日，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9-1-27，第77—80页。
- ㊹《李协和赞成总统亲征》，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6日，第1张第3版。
- ㊺《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1月2日，第1张第2版。
- ㊻孙中山：《复李烈钧嘉慰处置叛军得当并准加委滇军军官电》（1921年11月1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494页。
- ㊼《汪伍两代表谒唐虞庶》，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1月11日，第2张第6版。
- ㊽《唐继尧致函孙中山》，天津《益世报》1921年11月21

日,第7版。

④《李永和窦家法致唐继尧电》,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9-1-27,第51—55页。

⑤《唐继尧亲笔字条(指令)》,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9-1-27,第129页。

⑥《唐继尧回滇续闻》,《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4月1日,第3页。

⑦《唐继尧出席政务会议》,长沙《大公报》1921年4月9日,第2—3版。

⑧《唐继尧致北伐滇军胡若愚李友勋司令电》,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9-1-27,第153—157页。

⑨《唐继尧致张伯群等电》,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9-1-27,第103页。

⑩《唐继尧致张伯群电》,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9-1-27,第151—152页。

⑪《唐继尧赴梧及滇军拥戴之详情》,《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2月12日,第3页。

⑫冷眼:《陈炯明叛孙因果补述》,《商报》1922年7月2日,第3版。

⑬《梧州特约通信》,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16日,第1张第3版。

⑭《唐继尧态度表示》,长沙《大公报》1921年12月21日,第3版。

⑮《驻桂滇军决定回滇之探报》,《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2月28日,第3页。

⑯《唐继尧自柳州通电》,长沙《大公报》1922年1月11日,第3版。

⑰孙中山:《复顾品珍询北伐出师准备情形电》(1921年9月30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490—491页。

⑱《滇省反对滇军返滇电》,《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1月17日,第12页。

⑲《顾品珍为参加孙文组织的北伐请示作战计划表明行动决心的通电》(1921年11月18日),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

档案史料》第8期,第33—34页。

⑳孙中山:《复顾品珍嘉勉率师北伐电》(1921年12月13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498页。

㉑孙中山:《致顾品珍等望赶紧拔队北伐电》(1922年1月13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500页。

㉒孙中山对于唐、顾的区别态度,与唐继尧在云南的实力变化有关。在积极运作回滇的过程中,云南方面支持唐继尧的力量进一步增长,“除金汉鼎、李选廷、王洁修已来电表示决心一致进行,吴(学显)部六千余人,已在南防开始活动,周宗濂、华封歌、蒋光亮等现持观望态度外,顾品珍方面真能为彼作战者,仅有杨池生、杨希闵之两团。”参见《唐继尧致北伐滇军胡、李司令官电》,云南省档案馆,档号:119-1-27,第153—157页。另据时人分析,“唐继尧派其部下多数心腹回云南,宣传顾品珍对于南北两政府取骑墙的态度,以冀放逐顾氏。而顾品珍向广东政府亦矢忠诚,且将唐继尧为自己的野心,欲令云南大起波澜之事情,告诸孙文。”孙中山力争西南团结一致北伐,不愿云南内讧,故希望唐继尧“赞成北伐之计划,勿拘泥于局部的小问题”。参见《孙文不赞成唐继尧回滇运动》,《晨报》1921年11月7日,第3版。

㉓《上海快信摘要》,长沙《大公报》1922年1月13日,第2版。

㉔《孙总统制止唐继尧回滇》,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14日,第1张第3版。

㉕关于唐继尧“二次回滇”,可参阅谢本书:《唐继尧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21—137页。

㉖《唐联帅演说词》(1922年10月20日报载),《云南民治会报》总第1期,第4页。

㉗孙中山在广西组织滇桂粤联盟西路讨贼军,同时采取多种策略,包括拆散陈炯明、唐继尧、陆荣廷攻守同盟之计划,选定杨希闵担任滇军总司令,促成以滇军为首的西路军东下讨陈驱唐,占领广州,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创造了条件。参阅谭群玉、曹天忠:《孙中山的讨陈方略与北伐开局》,《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